

全球化与多元化中的文明对话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

摘要:全球化是现代性的持续伸展与扩张,一如现代化具有多样性,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复杂的多元多样问题。东亚社会的文化遗产和特定环境,决定了它与西方模式的不同,通过全球化背景下的启蒙反思和多元性条件下的文明对话,既可以检讨启蒙以来在西方话语笼罩下的价值追寻之缺失,又可以发挥掘井及泉的工夫、重新安立中国文化的重要位置。在文明对话中,注意克服启蒙以来的盲点,尝试建构新的人文精神,便有望开拓出更为宽广的论域来。

关键词:现代化;东亚社会;全球化;多元性;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5)02-0005-09

一般的印象,全球化是继续西化和现代化而发展出来的一个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国际化过程。大家非常熟悉的“西化”,是个以地域为中心的观念,其实质是从 17 世纪以后逐渐在西方发展出来的、以启蒙为代表的现代性,逐渐成为西方以外的各地区所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因此,“西化”也就是西方的文化逐渐向西方以外的世界扩张的过程。也许可以这样说,代表现代西方文明的是一种“启蒙心态”,因为启蒙可以作为一个文化运动来看,是一个不断发展之中的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心态。这种“启蒙心态”,如果把它当作意识形态来看,也许是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之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受到启蒙和现代性的影响。它在世界各地的影响非常大,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这些都和启蒙在历史上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交通、资本的国际化,经济、贸易的全球化,旅游的国际化,以及民主政治的普及,不仅是选举文化,也包括公共空间的拓展、公共理性的成长,使市民社会越来越成为相

对于政治以外的——包括媒体、学术、宗教、职业性社会组织——社会运动。使社会综合力愈趋丰富,特别是个性的解放,成为西方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特色之一。个性的解放,使得个人的自由度扩大,选择性加多,自我意识越来越强。如果把这些现象加在一起看,当作是启蒙的持续效应,那么启蒙当然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启蒙所代表的,在政治、社会、经济的潮流背后的一些基本价值。虽然这些价值根源于西方,但现在可以说已是普世价值,比如自由、理性、法治、人权、个人的尊严等等。在五四时代,大概突出的是自由和人权,严复曾经说过:“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当时人权的观念特别突出。后来因为救亡图存的力量特别大,逐渐便以民主和科学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

从“西化”到“现代化”

现代化理论在美国,始于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后

收稿日期:2005-02-21

作者简介:杜维明(1940—),男,广东南海人,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及哲学与儒家研究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万方数据

期,到了60年代,便讨论得非常多。当时有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学者,比如说帕森斯。另外芝加哥社会学家影响非常大,如伯格和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任教的艾森斯塔特,或者是讨论现代化和民主关系的亨廷顿,乃至比较年轻的、对宗教社会学有影响的贝拉,后者都是与当时哈佛讨论现代化有关系的学者。把“西化”变成“现代化”,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就是地域的观念为时间的观念所取代。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从西方发展的、是从西欧和美国发展的,但从时间的跨度看,这是有阶段性的。逐渐在西方之外,也会发展出类似于西方的这一工业化、都市化、凡俗化、科技化的形式,即各种类型的现代化。这个观念,事实上和西方启蒙的发展过程是相通的。所以,人类文明的发展要经过迷信的宗教到形而上的哲学、再到科学理性,从宗教到哲学到科学,从愚昧逐渐到理智。从阶段性来看,现代化把整个世界都用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来衡量,确定它不同的发展阶段,越是和西方接近的就越是现代化。

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到1949年,中国的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已经很热烈地讨论过现代化的物质形式和现代化的观念,而在美国是50年代后期,甚至到60年代初期才开始。现代化这种观念在中国早了20年就已开始讨论,并且讨论得非常热烈。当时上海的《申报》曾发起过一系列的学术辩论、全国性的大辩论,有好几个不同的议题。可能是三场不同的大辩论,有点像1923年在中国当时进行的科玄论战,即人生观与科学的论战。《申报》主持的三场论战,第一次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发展、现代化,应该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工业为主;第二次是以社会主义作为导向还是以资本主义作为导向;第三次是关于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还是以西化作为基础。胡适接受了陈序经的观点,曾经说“全盘西化”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在这个时候有点改变,说是要“充分地现代化”。当时有学者像冯友兰,提出我们要现代化是不是一定要西化,是不是西化就是现代化,比如说中国要发展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工业,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信基督教。有很多当时已经讨论得非常热烈的问题,北大的罗荣渠教授把这些资料集成了一本书,我想大家很熟悉,这就是《从“西化”到现代化》^[1]。这里面讨论的很多问题,提出的很多观点,客观来说比60年代在台湾进行的东

西文化论战和在80年代中国大陆进行的关于全盘西化,社会主义和传统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论证,在很多地方学术水平更高,讨论的问题更深刻。

从西方提出现代化的观念以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又有新的现象出现,也就是“东亚社会”的问题。有人说是“儒教文化圈”或者是“汉字文化圈”,有些人开玩笑说是“筷子文化圈”,“道”的文化圈。这个地区先以日本为主,后来是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逐渐地现代化,而且现代化的程度非常高,不管从那一种指标来看,都是充分的现代化。现在,社会主义东亚——包括中国、越南、朝鲜这些地区,现代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如果东亚这个社会能够现代化,它又基本上不属于西方文明(当然这些现代化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那么,160年来(从鸦片战争以后),东亚的知识分子都是持续不断地向西方学习,甚至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学术的共业。以日本为例,从明治维新开始,它向荷兰学习,就在长崎的外面,有很多荷兰的工匠、荷兰的传教士和荷兰的技术人才居住在那里。很多日本学者向他们学习,学习荷兰的技术、荷兰的观念。从“兰学”开始,以后又向英国学习、向德国学习,向法国学、向美国学。中国的情况也一样,从鸦片战争后的160多年来,一直向西方学习。因此,这个地区的现代化,从某个意义上讲,也该“西化”了;可是,这个地区体现的生命形态以及文化的表现形态,和西方的很多地方都不相同。

由此,深受西方的影响,但又有不同的文化特色,怎么去理解呢?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东亚乃至北美和欧洲,有一种观点(现在看起来这个观点不是很成熟,也许是因为没有深思熟虑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是从大西洋到了太平洋,亚太地区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强,东亚文化圈影响非常大,甚至提出有“大中华经济圈”(包括海外华人的经济圈)。当时有一些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和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可以配合,甚至有人提出“儒家资本主义”,说这个叫“关系资本主义”。台湾学者、香港学者、北美学者,多半不是从事儒家研究的,也不是人文学者,而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者,他们讨论得非常热烈。我当时担心,韦伯讨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时候,就碰到了这样一个挑战。从基督教的传统来

看,财富像身上的外衣,财富对基督徒来讲,不应该是重要的,因为《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一个富人要上天堂,要比一个骆驼穿过针孔更困难。财富,不是因之得福而是因之得祸。但韦伯讲的这句话,没想到一百年后身上的外衣竟成为“铁笼”。基督教的文化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又被整个资本主义所腐化。儒家伦理,如果促进了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要腐蚀掉整个儒家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商业化,很多问题值得从不同的层次来考虑。有人说:因为儒家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儒家伦理很健康、非常好;有些学者则非常担忧。因为这些观念,当时有学者甚至提出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现在还有人提是中国的世纪、华人的世纪。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开始在泰国,然后影响到马来西亚、影响到印度尼西亚,也影响到韩国。属于儒教文化圈、又是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的崩溃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撼。西方的学者、东亚的学者开始对80年代提出的观念作非常全面的修正,甚至有学者说我们完全搞错了。儒家伦理所代表的“关系资本主义”和“儒家资本主义”,它的困难、它的缺点非常多,其实是一种“裙带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甚至是官商勾结。韩国的问题就是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勾结,贪污腐化,因此没有透明度、没有公信力、没有信任感。所以这个地区正是因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没有办法有真正的竞争力,甚至说10年、20年这个地区不能再起来。没想到一二年后,韩国、新加坡、甚至泰国,三五年都恢复了。大家觉得非常困惑,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如果来了解东亚,所谓的“儒教文化圈”,它确实有几个特色。

首先我要说明,从方法学上来讲,有的人说我的观点是文化学的观点,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不同,文化学的观点有“文化命定论”的迹象,因为有儒家伦理,所以有这些情况。这是非常大的误解。如果你要把文化当作是非常重要的解释模式,甚至说“儒家文明”,你要非常小心。第一是完全不能用因果的关系来讨论——因为有儒家伦理,所以有儒家精神,这是绝对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你仔细地考虑,儒家伦理既非必要条件,又非充分条件。说不是必要条件的意思是:完全没有儒家伦理,照样可以发展。假
万方数据

如必须要有儒家伦理才可以发展,那美国可以发展是荒谬的。如果说有儒家伦理可以发展,那在清代、明代,也有儒家伦理,可中国没有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资本主义,而只有商业资本主义。所以,它既非充分条件,又非必要条件。但是,这又是有关关系的。那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对这些关系要做全面的理解,应该作为解释过程中的添加价值。什么叫添加价值?如果我们对经济现象可以用经济的原理来理解的话,从土地的运用、资金的运用、经济的效率、经济的策略各方面的理由来解释,能够把这些现象解释清楚,那我们就不必担心政治的问题和非经济的因素,不必讨论那些因素。假如我们觉得不能解释,还要把政治的因素带进来;但如果政治因素带进来、制度因素带进来可以解释清楚,就不用讨论社会结构、社会传统;假如用社会结构、社会传统也能解释,那就不要讨论文化;如果都不能解释,我们就要借助于文化因素。一个经济学家如果对政治没有很大的敏感度,还是可以成为很好的经济学者。但是一个政治学家如果要了解社会,那他除了政治问题以外,经济问题还是要有所了解的。社会学家最好对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也要有所了解。我们从文化的立场来考虑,那我们对经济、政治、社会的重要性,都要有所认识。所以我要从文化的角度、从伦理的角度来解释,基本上我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因素都得要照顾到,如果不能照顾到的话,就很难把这个现象讲得比较清楚。

如果我们用文化的观念,平常一般是两种用法。一种是通义,比如说中国文化、闽南文化、广东文化。这种用法多是涵盖性的,是对总体的认识。它的特殊性质常常不能量化,不能用数据来表示;但每个人说了以后,心里有一种感受、有一种认识、有一种印象。另外一种用法,文化的作用和其具体领域分不开。不是经济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是文化问题。文化渗透到各种领域,所以有经济文化、有政治文化、有社会文化等各种不同的文化体现。另外,文化有总体性,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心里要有数。但是如果你来问我如何定义文化?我想学者们有200多个定义,所以没办法很容易地回应。

从“家族相似”来看,东亚这个地区有什么特色?第一,这个地区——包括日本、韩国、越南、中国,政府的作用非常大。而且一般的知识分子和一般的民众对政府都非常地关切,因为政府做好事或者做坏

事的影响面都很大,所以一般的人认为政府的责任是全面的。政府不仅要使得社会安定,经济能够发展,大家生活小康或富裕,而且政府有责任发展教育。它的参与是全面的、责任是全面的。当然,不希望政府干扰每个领域,经济活动相对独立,社会的各种不同活动相对独立,但希望政府的责任是全面的。第二,非常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家庭在整个东亚社会都发生了问题,离婚率越来越高,家庭解体的情况非常严重,亲情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各方面出了很多问题。但相对于欧美、北欧、拉丁美洲,(东亚社会)家庭的稳定性仍然很大。譬如新加坡,它有五大原则,但也通过一系列法律来维持家庭的重要性。第三,这个地区对“社会”的理解很特别——社会不是完全通过契约,社会是一种信赖社群。但信赖社群不表示诚信度特别高,而表示维持社会机制不能纯粹靠法律,而是要靠法律以外的很多资源。当然,徒有法不行,大家都相信,如果没有法律的基础,想通过人治、德治来维持社会秩序是没有可能的。可是大家还是基本认为社会不应该建构在契约上面,所以比较注重和谐、注重调节、注重对话。第四,就是教育的作用,特别是终身教育、继续教育、持久教育,形成了“学习的文明”,特别突出学习的重要性。

这些特色使我们觉得东亚社会(当然这些特色在其他的社会也有)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生命形态——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又跟西方有所不同。这至少有两个启示、两种含义。一个含义是现代化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现代化虽然是从西欧和美国开始的,但可以拥有非西欧非美国的文化形式,即东亚的文化形式。另外,现代化或现代性和传统有着复杂的内在关联。儒家的传统多元、多样,中国的儒家传统和越南、韩国、日本的儒家传统都不太一样。但这些传统在东亚社会发展现代性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塑造了独特的现代性。这使我们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就整个西方现代性的出现而言,本来就是多元多样的。英国的现代化和德国的现代化、法国的现代化、北欧的现代化就有所不同,虽然它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如果用民主化作为了解的对象,法国的民主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发展出来的很多课题有关系,如果没有平等、自由、博爱这些理念,就没有办法了解法国的民主。但英国的民主是渐进的,没有突变,缺乏革命精神;而且传统的形象在今天的英国非常重

万方数据

要,君主立宪是它的传统;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反而对宗教特别不重视,法国社会的宗教影响力却非常大。德国的民主和德国的民主意识有密切的关系。我曾经参加过一次讨论,在意大利讨论西欧的民主、讨论西欧的市民社会,大家都认为整个欧洲的经验 and 北美的经验有很大不同,美国的现代化、美国的民主和欧洲有很大不同,因为市民社会的突破在美国是一种独特现象。既然在现代化过程中,原有的发展是多元、多样的,美国的发展不同于现在的东亚,日本的模式在东亚文化圈另辟蹊径;既然现代化可以拥有东亚的文化形式,没有理由说将来不会有东南亚的形式,或者南亚,或者拉美,甚至伊斯兰、非洲的形式,这是一个大问题。

现代性与多元性

现代性是多元多样的,如果认为它有多元多样,那我们就应该跳出“2134”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什么叫“2”?就是在冷战以前世界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在有些学者认为,美国是超级大国、资本主义的圣地,一枝独秀,这就是“1”。实则这个可能性不大,也许可以维持四五年,往前看,各种不同的挑战都使它不可能一枝独秀。美国的反恐,刚开始是单枪匹马,现在布什不得不让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参与处理伊拉克的民主化问题,一枝独秀不可能。特别是我们所关注的人的安全的问题,而不仅是国防的问题。“3”是指现在的东亚,有很多学者认为社会秩序两极分化和一枝独秀都不太可取,最好是三足鼎立。什么是三足鼎立?一个以美国为主的核心,再加上欧盟,再一个就是东亚。东亚基本上是中国和日本为主。有些学者发现印度的发展非常快,所以也许从“3”要到“4”。那么,难道俄罗斯不再发展?难道拉丁美洲不再发展?伊斯兰世界不再发展?非常难说。就拿俄罗斯来看,我到莫斯科去过,它的现代动力非常大,虽然十几、二十年来的发展和中国反差很大,但俄罗斯有非常丰富的人文资源、宗教资源(东正教),它的文学艺术资源非常丰富。再有自然资源,俄罗斯有石油。如果世界油价增加一块钱,俄罗斯收入就增加56亿美元。如果说从资源的角度来看,像俄罗斯这些地方,或者是中东,都有它发展的潜力。

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多元的角度

来考虑世界秩序。当然世界秩序应该是多元多样的,但确实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从西化、现代化到经济全球化,社会越来越趋同。所谓“地球村”的出现,不管从正面和负面来看:从负面——生态危机、恐怖主义、吸毒、暴力,还有各种其他的理由,使得这个地球越来越休戚与共;从正面来看,互联网、资本流动、信息、科学技术、交通、各种旅游业,使这个世界越来越小,有趋同的倾向。从文化全球化来看,差异性的的重要还是不可消减的。如果是经济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是指这个世界越来越小、越来越趋同;而全球化,特别是文化全球化,是不是突出了一种认同的意愿和重视宗教的特性?这是值得大家考虑的问题。

有些学者强调,文化全球化更能体现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比如说英文的重要性。有很多学者认为,英文在逐渐主宰世界,中国认识英文的人越来越多,印度两亿中产阶级中有好几千万可以自如地运用英文。英文在世界上的传播非常非常快,以前世界的国际性语言是法文,现在法国最担忧的就是英语。另外,从娱乐来看,一种情况就是好莱坞的电影。有中国从事电影业的朋友告诉我,好莱坞电影在世界的迅速推展,使中国国产电影已降到了百分之十几,而好莱坞电影已占到70%到80%。连续剧、速食、流行歌曲、服装、连锁店、各种不同的超级市场,这些都显示了文化全球化,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向世界各地的输送影响,使得世界越来越同质化。另外还有一种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叫“教授俱乐部文化”,就是在学术界讨论的一些基本理念,或者是生态环保的理念、女性主义的理念,或者是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各种不同的关于历史的解释,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的解释模式,这些基本的东西,也多半来自西欧和美国。

因此在西方之外,只有4种可能:面对西化、现代化、全球化,一种是排斥、抗拒,这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采取的方法。一种是接受,甚至全盘接受。东亚和中国是非常好的例子,尽量接受。再就是让不同的因素,即现代化、西化和本土化同时并存。比如说沿海非常西化,但在内地、大西北却没有大量的西化;在城市有很多西化,但在乡村没有西化。还有最好的方式,便是融合,形成一种新的互动。

但不管是用融合的方式,还是共存、排拒,或是接受,都是被动的,主动权始终在西方,主动权在美方数据

国。这个当然很有说服力,一般我们的印象也是如此。从美国本身来看,我的哈佛同事亨廷顿——他提出过“文明冲突”(我在强调“文明对话”),最近他担心什么呢?担心墨西哥对美国的威胁。墨西哥怎么会对美国有威胁?他是从文化来考虑的。他担心什么?他担心加州再过10年、15年,第一语言是西班牙文,第二才是英文。德州和佛罗里达,西班牙语的力量也非常强。能不能够维持美国成为一个英语国,这是美国知识分子所担心的事情,因为西班牙语的影响力太大了。另外在加拿大,法文和英文的斗争非常激烈,假如不能取得协调,加拿大会分裂。再有,像日本的漫画,在美国的年轻人当中流传得非常快,不懂日文,但就喜欢看日本的漫画,这是不是日本的文化侵略?还有就是印度的电影,现代印度电影在美国有一定的影响力。东方的音乐——不是中国、日本的音乐,而是土耳其的音乐、印度的音乐,对西方影响非常大。现在不完全是从西方望东方,而是从西方之外也可以看西方。从移民的角度看最有趣,说到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国家,你会想到英国、想到法国、想到德国、想到意大利,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大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人口都差不多,大概5000多万,而5000多万中有10%以上都是外来人口,就是外劳。因为外劳一定不属于法国人、不属于意大利人、德国人或英国人,所以语言就不统一。为什么巴黎最担心伊斯兰文化的问题?也许你们看到了法国政府的规定,你只要到法国的中学,女性中学生不能够戴面纱,这不符合法国的传统。但是伊斯兰教徒戴面纱是应该的,戴不戴面纱已经成为世界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土耳其这个国家基本上是政教分离,如果你戴面纱,就可以抓你,因为你是政治抗议。在法国戴面纱也是政治抗议。可有些地方你不戴面纱是政治抗议,像阿拉伯世界。一个很简单的装饰,一个简单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政治含义。所以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都是忧心忡忡,美国也一样。如果是在50年以后,美国的某些地区,信仰新教的美国人会降到50%,也就是没有一个民族是多数,那么它的文化认同怎么处理?文化多元性怎么处理?从速食品的角度来看,麦当劳在中国有700多家,而现在曼哈顿地区大概有超出3000以上的中国餐馆,日本的寿司店大概也有上千。到底是美国的麦当劳成为代表全球化的力量,还是中国的“宫保鸡丁”成为全球

化的力量?你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中国餐馆,这是一个另一种的全球化,很值得讨论。我们把麦当劳现象当作一个严肃的课题来处理,不是把它当作笑话。我的一个同事,他组织了相当大的讨论,研究麦当劳在中国、在日本、在欧洲、在其他的地区。印度尼西亚、印度发展的情况就很值得注意,麦当劳的成功就是本土化,到了不同的地方就变成了不同地方的麦当劳。到了印度,就卖素食的汉堡包,原来是牛肉的,但到了印度以后便是素食的。到了日本,又会有不同的变化。甚至有人得出结论,跨国公司的成功就是本土化,假如一个大的跨国公司不能本土化就不能成功。比较有名的例子是IBM。以前IBM创造自己的文化,不管你是属于什么地方的人——日本也罢、中国也罢,你要成为IBM就要发展IBM的文化,甚至他们的衣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态度都受IBM控制。现在改变了,你到不同的地方就要入境随俗、就要变化,对当地的文化能够配合,才能进一步发展。

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多样性和多元性,从全球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多元多样本土化的过程。所以在2004年9月,北京有个文化高峰论坛,有个《甲申文化宣言》——“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的文化宣言。我是基本上接受这个宣言的,我也是个签署者。这个文化宣言由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许嘉璐、王蒙等发起,加起来大概有50多位签名。有一段话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历史环境和历史进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解读、辨识、竞争、对话和交流的动力。我们期待经历过全球化的洗礼,原生状态相对独立的多样文明将获得更为宽广的参照,获得坚定的认同。另外有一段话:“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认同归属,应该认识中国文化5000年生生不息、连绵不断的重要原因,在于它是发生在上古时代多个区域、多个民族、多种文化的融合,它不但有自强的力量,而且有坚韧的气质、灵便的智慧。”意思是说,从全球来看,文化多元多样的情况还会继续。从中国文化本身来看,正因为是从多元多样逐渐经过对话交流而形成的源远流长的文化,才有生命力,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万方数据

对话中的文化理念和人文精神

现在促进世界发展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传统,就是我前面所谈的“启蒙心态”所代表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乃至自由、理性、人权、法治。这些价值,不管我们在世界任何地区,对它的影响,对这些发展的潮流,我们必须要有所回应、有所理解。可现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碰到了极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人的存活能力受到了极大的质疑,这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作为一个种性能不能存活下去?10年、50年也许没问题,但50年以后,人类到底能不能存活,能不能自力更生一直存活下去?这个问题的解答,仍要以“启蒙”为代表,因为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为止,虽然多元多样,但是引导我们面向21世纪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主流的文化力量,即启蒙所代表的文化力量——科学技术、各种不同的市场机制、民主政治。这套西方所代表的思想,面对人能不能存活这个大的议题,它有几个无能为力的地方。这不是说这套思想本身体现的价值有问题,而是它所碰到的困境是它有盲点,有很多领域它没有照顾到。正因为它有盲点,使得它能照顾到的领域不能够为我们创造一条向前走的康庄大道。

第一个缺失,就是这套思潮基本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以人为中心。因为启蒙的发展是从中世纪走出来的,我们刚刚提到所谓中世纪的迷信到形上学到西方理性,因此对于精神领域、对宗教没有很好的理解。我曾经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这也是影响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论坛,在2000年前,它的重点全部在经济上。到2000年,我第一次参加时,开始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21世纪的宗教问题,另一个是文化认同问题。这两个问题提出来,就表示人类文明的发展从迷信的宗教到形上学、到理性这个观点本身也许有它的片面性。如果我不了解宗教,从世界经济论坛的角度来看,也很难了解21世纪;如果没有文化的认同,也很难了解21世纪。所以人类中心主义对于精神世界不了解,这是启蒙反思的人本主义的一个大的盲点,突出人类中心成为一个价值偏向,对自然的理解不够。

第二个缺陷,我们叫它“理性的傲慢”。理性本身是无问题的,但当我们受到理性的影响而发展出一

种心态来,叫做理性的傲慢,我们会碰到非常大的困难。理性主义有一个基本设想,即理性的光芒可以把愚昧去除掉,理性的光芒能够照耀到的地方,黑暗和迷信就没有了。甚至有这样的理想,整个宇宙就像是这个房子,我们叫光能够照亮各个不同的角落,宇宙内的一切我们都可以知道。启蒙以来,17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科学家都有这个意愿,人类向外开拓,人类的理解越来越全面,黑暗的地方越来越少。现在的理解正好相反,我们理性的光芒和黑暗的扩大是成正比的。我们越知道我们越想知道的,而我们越不知道的东西就更多;我们越能够认识到我们能够认识到的地方,我们就越意识到还有更多应该认识到而没有认识到的地方。所以,知识的扩展和无知的扩展是在同步进行的。现在真正第一流的科学家是非常谦虚的,绝对不傲慢。只有一批科学主义者,把科学当作意识形态的人,才有这个傲慢,叫做理智的傲慢。理性的傲慢,事实上有一种工具理性、乃至社会工程的观念,就是我们来设计,我们有头脑、我们聪明、我们了解全面、我们有好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做一套好的设计可以适合千秋万世,但是就没有想到有些未预期的不良后果的出现。我们要走这条路,走了一半以后可能就没有回头路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是建筑、伟大的工程,如南水北调、三峡工程,所有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很多人在忧虑,你可以得到电、得到能量、得到水,可以得到燃料,但是你不知道未预期的后果。这是理性傲慢的大问题。还有就是东西越小,越是本质的,越简单,当我们掌握了最小最简单的东西,宇宙是怎么建构起来的我们就可能了解。但是越小不一定越简单,也许越复杂。你越去了解、越去认识,就越觉得这中间有一些完全无法掌握的东西。

第三,理性的傲慢,再加上没有办法对付的非理性和反理性的力量,就使得从启蒙之后只好以一种浮士德的精神去了解世界。但是了解的目的,并不是去认识,而是去控制、去转化。对自然,以及对其他各民族的宰制,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心态,都和浮士德精神有关系——不知道为什么花那么大力量做这些事情,我情愿和魔鬼打交道,我要有新的知识、新的智慧、新的经验,我尽量去做,后果不计,没有这种勇气去做,就不能够体现我作为人的真正创造精神。这种没有办法处理的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力量,从
万方数据

启蒙发展以后,在20世纪非常通行。社会学家鲍曼(Z.Bauman)指出:假如任何一个人要来美化启蒙所代表的现代性——了不起,我们已经走出了迷信的中世纪,走出了玄学;假如任何一个人有这种肤浅幼稚的“大科学理性主义”。他说:我们只要一个字便可以反证,叫奥斯维辛(Auschwitz),就是纳粹的集中营,纳粹集中营也是现代文明的体现^[2]。20世纪是人类最血腥、最残忍的世纪,像一战、二战,这完全不是因为纯粹的天灾问题,而是人祸的问题。

21世纪开始便发生了“9.11”,可能预示21世纪比20世纪更残忍。摇摆在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之间所造成的困境,人类中心主义、理性的傲慢和非理性的力量,如果持续,这都是大问题。这些问题是启蒙所带来的,不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后面的价值有多么光辉灿烂,我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处理的,这就需要有更宽广的人文精神来面对、来处理。

如果需要有一个新的人文精神出现,哪种类型的人文精神会出现?一般来说,现在的人类社群,如果把所有的(这种说法可能太浮泛)精神资源都能调动起来,有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人类现在的困境?就西方学术界而言,有早期的基督教、犹太教、希腊哲学传统,乃至面对西方现代精神滋生出的那些困境所做回应的,像女性主义、生态环保主义,还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有些学者认为,除了这些之外,应该把非西方的精神资源,像印度教、佛教、中国的儒家和道教,还有其他地区甚至各种不同原住民的精神资源,都调动起来。当然,讲得比较宽泛一点,每一种资源——从多元多样的角度看,都对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可以提供帮助和参照。我们不能只迷恋于启蒙发展出来的精神,用一种以人类为中心、以傲慢理性无法处理的非理性力量为意识形态的“理性”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在多元的倾向下,各家有什么资源?在什么意义下为我们提供一些资源?假如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同质化的问题,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出现,越来越休戚相关,社会各种认同、各种不同的价值,越来越相对独立。我们就迫切需要一种思潮,来全面应对人类所碰到的整体的问题和人类根源的问题,这就是开放一种生命共同体。所有人都有天下一家、四海一家这种思想,每一个人、每一个社群、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立性,这两个

观念怎样配合?假如全球化可以导向生命共同体,同时也可以导致霸权,那唯一能使生命共同体的出现不导致霸权的,就是对话。假如根源性的意识越来越强,而在根源性意识的发展中,不导致一种排他性、排斥性、排外性、具有侵略性的原教旨主义,也需要对话。那么,对话的机制(就是如何才能对话),预示着前面所讲的价值——自由、理性、权利、法治——以外还有一批价值必须开发出来,这些价值和前面所讲的价值没有矛盾冲突,反而可以补其不足。自由之外,应该突出公义,即正义,只有自由没有正义是不行的。理性之外,还要有同情,不仅是同情甚至是佛教所讲的慈悲。权利之外,应该有责任,个人的独立尊严之外更要有社会的融合、社群的融合。这些价值,比如说正义、诚信、责任、社群,也是普世价值,同前面所讲的启蒙所代表的价值,应该是符合的。

有些学者认为,很多有中国特色、有儒家特色的价值是地方价值,是“我们”的价值,而自由、人权、平等是普世价值。这中间是有问题的。比如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所代表的基本价值,仁爱、礼貌、正义、智慧、信任,这些就不仅是儒家的价值,也是普世价值,虽说它的根源不在西方。所以,怎样把这些价值开发出来?显然要通过对话。那么,对话最低的要求便是容忍,如果互相不能容忍,就无法对话。只是容忍不行,还要接受对方的存在。只有接受对方的存在才可能发展尊重,有了尊重才有可能互相参照,能够互相参照才能互相学习,这个过程非常艰巨。

2001年,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安南组织了一个文明对话小组,我参加这个小组已有三四年的时间。小组讨论认为,如何发展文明对话?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必须履行:第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恕道必须和入道结合,把人当人的“入道”和仁爱的“仁道”结合起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第一个原则就是,对我很好、我认为很重要的价值,但我不一定要强加于人。这是犹太教的原则,也是儒家的原则。第二,我要发展我自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也是康德的原则,把人当人的原则。基本上很理想,但是可以付诸实施。如果通过这样的渠道,我们会面对西方所提出的这些启蒙所代表的价值,而使它的范围扩大,使它的伦理基础、道德基础加强,这个对话的可能是有的。如果要建构这样的对话,我们应该先建立自己文化的主

体性,这是北大楼宇烈先生提出的观点,我赞成这个观点。不是保守主义,而是文化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是开放的、有弹性的、变动不拘的,同时又有自我反思的能力。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绝对不突出我们自己文化的优越性,不说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是属于世界大家庭的成员,但我们有我们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不仅我们能够享用,而且也能提供给其他国家。

21世纪的真正竞争,不纯粹是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同时也是文化理念的竞争。比如说下围棋,如果棋高一筹,在考虑全盘棋的走向时,他能够照顾到的问题比对方要多,他可以考虑到十步以后的千变万化,而对方只能考虑到三步、五步,他所考虑的问题对方没有考虑到,但对方考虑的问题他全部考虑到了,而且更加深刻。过去160年,东亚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向西方学习;因为向西方学习,所以慢慢地形成了一种非常健康的“学习的文明”;同时学习的文明也使它本身空洞化,认为我们没有资源,所有的资源都是外来的。“学习的文明”的好处是开放,对世界各方面的东西都很敏感,但也有它的不足。现在建立主体性的意识,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一枝独秀,也不是简单的游戏间平衡的斗争,而是确实我们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源,面对人类现在所遇到的困境,我们可以提供。而资源的提供,使得我们的主体性加强,能够和对方进行对话。通过容忍、通过承认,互相尊重、互相参照、互相学习,这种心态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想提一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文化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比较广),包括中国大陆、港台、新加坡、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乃至在世界上一批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的外籍人士——因为想要了解中国、想要和中国打交道,他们可能是学者、媒体工作者,可能是政府的外交官、企业家——这些人之间进行了长期的互动。在80年代,广义的“文化中国”出了几位很有智慧的长者。像钱穆先生,在他晚年的时候口述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特别提到人心、天道合一的问题^[3]。季羨林先生很感动,同时把他的文章收到了自己的文集里向大陆传播,王元化、李慎之、张世英等先生,都对这些观念做出了回应。冯友兰先生在86岁以后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放弃了

他在文革前突出斗争哲学的观念,回到“仇必和而解”一路。如果说回到张载“四句”,这当然比较符合“天人合一”的观念。不管像冯友兰当时是在北京、钱穆在台湾、还有唐君毅先生在香港,这些观念不是一种含情脉脉的对宇宙的浪漫理解,而是深刻地重新理解人的问题,都接触到了 4 个侧面。将来可以展现比较宽广的人文论域,面对现代文化的多样性而继续发展启蒙所代表的理性价值,更宽广的人文论域是必要的。这个宽广的人文论域一定要牵涉到 4 个侧面——个人、社会、自然和天道。个人的身心如何整合,就是个人如何能够完成自己的人格,如何发展自己。个人和社会如何进行健康的互动,使社会从家庭一直到人类社群乃至生命共同体一直发展下去。第三个基本原则是人类和自然如何能够持久地和谐。再有就是人性和天道如何能够相辅相成。这 4 个侧面同时展开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情况下,经过和西方进行对话,一方面能够继承西方的启蒙精神,另外面对 21 世纪出现的一些困境,它可以提出更宽广的论域,这个论域至少可以成为大家的参照。现在在国内,在“文化中国”,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在学术界、政府、媒体、企业,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中,在讨论:到底中华民族

的文化主体性是什么?到底这个主体性对我们将来的发展、对我们的周边区域、对我们的竞争对手(比如说比我们发展得更快更全面的西欧和北美,或者发展得比较缓慢的印度),应该提出什么样的观念?这是不是可以达成一个新的共识?这是很值得大家进一步来考虑的一个大问题。

参考文献:

- [1]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2]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24-25.
- [3]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N].联合报(台湾),1990-10-26.

【责任编辑:董世峰】

(本文是杜维明教授应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的邀请,于 2004 年 11 月 13 日在深圳大学发表演讲的记录稿,由深圳一方亚伟速录科技有限公司电脑速录,深圳大学国学所景海峰整理,并经杜维明教授本人审阅。)

Dialogue across Civilization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Pluralization

DU Wei-ming

(Harvard University, U.S.A)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the continual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modernization. Like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has its diversity as well. Because of its own cultural heritage and unique environment, East Asia follows a different model from the west. Through enlightened reflections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a dialogue across civiliz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pluralization, we may identify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value pursuit dominated by the western discourse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establish the Chinese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player. In the dialogue across civilizations, we will be able to open up broader perspectives if we try to avoid the blind spots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construct a new spirit of humanism.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East Asia; globalization; pluralism; spirit of humanism